

UNAN

YOUXIUSHEHUIKEXUE

ZHUZUO

HEHUIKEXUE

回眸苏联文学

何云波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I512.095/5

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回眸苏联文学

何云波 著



北京教育学院图书资料中心



0000146686

湖南人民出版社

SAH85/01

446986

责任编辑:杨彦
装帧设计:尹文君

回眸苏联文学

何云波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科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字数:188,000

ISBN7-5438-3382-4
I·358 定价:14.00 元

目 录

自序：我与苏联文学的结缘·····	(1)
第一章 苏联文学：潮起潮落·····	(11)
第一节 苏联文学：世纪末的回眸·····	(11)
一 真实的误区·····	(11)
二 历史语境中的文本·····	(14)
三 走向边缘·····	(19)
第二节 当代潮流：从“解冻”到第二次“解冻”·····	(22)
一 “解冻”·····	(22)
二 乍暖还寒·····	(26)
三 第二次“解冻”·····	(30)
第三节 兴盛与危机：改革时期的苏联文学·····	(34)
一 回归的文学·····	(35)
二 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38)
三 潜在的危机·····	(42)
第四节 沉重的十字架：当代苏联文学之反思·····	(46)
一 人道主义的宗教化·····	(47)
二 战争与人性的二律背反·····	(51)
三 哲理化：一种矫情·····	(53)
四 使命感与轰动效应·····	(56)
第二章 文学：人与土地·····	(59)

第一节 文学中的乡土·····	(59)
一 城市与乡村·····	(59)
二 人与土地·····	(64)
三 双重身份与文化选择的困境·····	(69)
第二节 寻根,回到人本身·····	(74)
一 一个古老的劝善模式·····	(74)
二 土地意象与耶稣的象征变体·····	(78)
三 道德感与历史、现实感·····	(83)
第三节 乡下人与乡下人的文学·····	(87)
一 叶赛宁·····	(88)
二 舒克申·····	(92)
三 艾特玛托夫·····	(96)
第三章 主流话语与文学经典·····	(100)
第一节 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00)
一 建构英雄人格·····	(100)
二 “城”与“市”·····	(103)
三 文本的对话·····	(103)
第二节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文化选择的困惑 ·····	(107)
一 西方战争文学传统与瓦西里耶夫·····	(107)
二 战争与人性的两难选择·····	(110)
三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与中国文学·····	(115)
第三节 当代上帝与道家智慧:《断头台》与《古船》 比较论·····	(119)
一 原罪:人性的迷狂与拯救·····	(119)
二 文化选择:柔性原始与现代精神·····	(123)
三 文化冲突与作家的两难处境·····	(131)
第四节 艾特玛托夫小说与神话模式·····	(133)

一	故事：作为仪式的象征·····	(136)
二	结构与母题：时间循环与原型回归·····	(143)
第四章	肖洛霍夫：在中心与边缘之间·····	(153)
第一节	关于肖洛霍夫的对话·····	(153)
一	两种声音·····	(153)
二	中心与边缘·····	(159)
第二节	《顿河故事》：革命与人性的对话·····	(163)
一	创作源起·····	(163)
二	革命与人性·····	(166)
三	“自然主义”乎？·····	(171)
第三节	《新垦地》：良知的限度与选择的两难·····	(174)
一	“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	(175)
二	农业集体化：赞歌与悲歌·····	(180)
第四节	《静静的顿河》：众声喧哗·····	(186)
一	历史与个人·····	(186)
二	人性的魅力与可怕·····	(189)
三	两难之境·····	(198)
四	乡土情结·····	(203)
第五章	帕斯捷尔纳克：知识者的寻求·····	(209)
第一节	说不尽的《人与事》·····	(209)
一	孤独中的寻求·····	(209)
二	古典传统的新范本·····	(212)
三	此情可待成追忆·····	(214)
第二节	《日瓦戈医生》：二十世纪的启示录·····	(216)
一	终极价值的寻求·····	(216)
二	道、势选择与生命真谛·····	(218)
三	中西文学中的两种死亡哲学·····	(223)
第三节	《日瓦戈医生》与俄罗斯文学的圣母崇拜·····	(228)

一 一个俗套的故事·····	(228)
二 圣母崇拜原型·····	(230)
三 文化恋母情结·····	(233)
后记·····	(238)

自序：我与苏联文学的结缘

1993年，《世界文学》杂志社举行“我看《世界文学》”征文活动，当时苏联刚解体不久，编辑部的张小军女士来信，让我写点文字，为落寞的苏联文学“呐喊”几声。于是，就在我当时住的一楼的一间潮湿晦暗的屋子里，在老鼠们咬啮木柜、嬉戏打闹的伴奏声中，我提笔写下一个题目：无言独上高楼。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脱胎自李煜的《乌夜啼》：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李煜是亡国之君，亡国之音哀以思。我写苏联文学的话题，自然不想过于凄凄惨惨戚戚，但面对那片早已融进我们的爱与泪、激情与悲怆的土地，面对它的巨变，我们又总也无法摆脱那种别有滋味、欲说还休的心态。一字之变，也许便体现了这种矛盾。最终，我还是以追悼苏联文学的心情，含泪唱安魂曲一般，写下了那篇后来获征文奖的文章。

—

说到苏联文学研究，其实我们与上一代学者已有很大差异。他们大多在20世纪50年代直接接受苏联的教育，对苏联的一切有着出自本能的崇敬、亲和感；而我们，作为60年代出生的一代，从小听惯的口号是“狠斗帝、修、反”，“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苏联的许多作品，即使可以阅读，也是“供批判用”。我

们作为苏联文学的阅读者，已少了一分崇拜。日后作为研究者，多了一分冷静的审视、批判的分析的眼光。当然，这种“批判”与60年代的“大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不同的。

李皖在《读书》（1997年第7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引用许晖《疏离》的一段话来说明“六十年代人”：

我们诞生在六十年代，当世界正处在激变的时刻我们还不懂事，等我们长大了，听说着、回味着那个大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事迹和风景，我们的遗憾是多么大。我们轻易地被六十年代甩了出来，成了它最无足轻重的尾声和一根羽毛。崔健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专辑，其实是对我们这代人下的一个精到的定义和总结：红旗下的蛋；但是，它下得太晚了。

于是，这只“下得太晚了”的蛋，终于没有赶上那历史的“好时光”，只能成为那“伟大时代”的旁观者。但是，我们毕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尾声，从童年到少年，理想主义的激情，同样在我们心中激起悠远的回声。我们伴着《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大。一方面，我们在批判“苏修”，另一方面，苏联文学又激起我们本能的亲切感。保尔关于人生的名言，被我们恭恭敬敬地抄在笔记本上。保尔与冬妮亚的爱情，在那个缺少温情的时代，犹如涓涓的细流，渗入情感的沙漠，犹如冬日的一缕阳光，使我们对春天产生朦胧的向往。当然，同时我们也接受了保尔对冬妮亚的评判，把冬妮亚喜欢打扮得好看一点出席保尔和他的同志们的聚会，理所当然地看做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

那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时代，在清除“封、资、修”之后，我们惟一能接受的，除了国内那些充满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的作品，就是屈指可数的部分未“修正主义化”的苏联文学作品了。故乡是湘南一个小村庄，在极度的封闭和精神的饥渴中，我对凡是印在纸上的文字，都似有一种虔诚的崇拜，饥不择

食地寻找一切能找到的东西，囫囵吞下。就这样懵懵懂懂地，我们走进了新的时代。

1979年，当我走进大学，走进书的海洋，就像一个饿汉，面对一桌过于丰盛的筵席，反而不知所措了。在思想解放的时代氛围中，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学术思潮：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及西方文学作品，我们惶惑、惊喜、感奋，而后一顿大嚼。于是，我们自命为思想激进的西方主义者，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者，对苏联、苏联文学，反而渐渐淡漠了。

说起来，我走上苏联文学研究道路，实在是有些偶然。读中学时，正碰上黄帅反潮流，张铁生交革命的“白卷”，“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老师号召我们也反潮流，问什么课可以不开，我们异口同声地答：英语。就这样“纯而又纯”地进了大学。学校有两位俄语老师，需要给他们安排课程，反正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据说苏联的哲学、文学比较发达，学校统一规定，哲学、中文专业通通都学俄语。学了几年俄语，因为对外国文学感兴趣，1985年报考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选择专业方向时，自然选择了俄苏文学。

说起来，研究生3年，并没有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俄苏文学上。新启蒙、新观念、新方法，在一阵阵的文化与学术的热潮中，我们都是赶潮儿，不断追踪新热点。回想起来，那时在对热点的追踪中，多了一分浮躁，少了一分做学问所必需的沉潜、积淀。但有一点却是无疑的，那就是在各种思想、观念的冲击中，对俄苏文学的研究，多了一些参照，有了一种新的审视的眼光。

那是一个新与旧、激进与保守杂然并陈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了叛逆精神的时代，这种叛逆也深深影响到我们这些学术上初出茅庐的后生。研究生刚毕业，1988年10月，恰逢全国70~80年代苏联文学讨论会在张家界召开，当时单位的领导不肯给差旅费，我只身一人去了张家界，在导师张铁夫先生领导的会务组

里，名义上从事会务工作，实际上是找个栖身之地。因为“会务”辛苦，大会学术组除安排张铁夫、王远泽两位湖南学会的负责人发言外，特许再给会务组的同志安排一个发言，就这样，我有了第一次站在全国性学术会议讲坛上的机会。本来我的学位论文写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开会时带了一篇评《断头台》的文章，除此之外，对当代苏联文学并无多少研究。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发言时，从《断头台》谈起，大谈了一通苏联文学所面临的危机与困境。偏激之言，不想却引起很大反响。这大约是我们一直对苏联文学充满崇敬感，现在突然有了一点不同的声音，这声音可能就像一支和谐的乐曲中的杂音，有些刺耳，但毕竟给人的听觉带来了一点冲击。会下，上海的夏仲翼先生找到我，让我把发言整理出来，交给他。于是，有了发表在《环球文学》（1989年第1期）上的那篇《沉重的十字架——对当代苏联文学的反思》。我带到会上的那篇《〈断头台〉：艾特玛托夫的困境》，刊在《苏联文学》（1989年第3期）。

因为张家界会议的机缘，我的兴趣转向当代苏联文学。在一种昂奋的激情下，1989年，论文写作竟一发而不可收：《兴盛与危机——对近年来苏联文学的思考》、《当代苏联反思文学的启示》、《寻根：回到人本身——对苏联文学寻根热的思考》、《苏联文学的第二次“解冻”》。单看这些文章题目的用词：危机、困境、十字架、解冻、反思，就可以想见当时的探索的热忱与批判的激情了。回过头来看，这些文章的观点不无偏激之处，但当年那份意气风发的豪情，却是至今想来，仍让人无限怀念的。

苏联文学与俄罗斯文化传统一脉相承，要真正认识苏联文学，还是得回到它的传统中去。而我的文学研究的起点，就是从俄罗斯文学，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的。199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小说的文化阐释》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更是一心一意做起了陀氏研究。1997年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

文化精神》出版，俄罗斯、香港、内地都有一些书评，后又陆续获教育部、湖南省的社科成果奖。在对陀氏的体察中，也算了结了与陀氏的一段痛苦情缘。不过，对这位伟大的作家的苦难的咀嚼，又给我这样一个凡俗的研究者带来了职称、经济上的种种现实的利益，这不知是我应该感到羞愧，还是这个时代的学术本来就是如此。

20世纪90年代末，我一边写关于肖洛霍夫的一本书，一边申报了一个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苏联文学的文化阐释》。这一课题的本意，就是对以前自己所做的苏联文学研究作一个总结，把它系统化，这也是一次对自我的回顾与反省。世纪之交，“瞻”前“顾”后，正所谓适时也！

二

回顾自己的俄苏文学研究之路，发现真正涉猎的作家，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艾特玛托夫四位而已。陀氏作为19世纪俄罗斯的一位非常复杂又独具魅力的作家，他既有俄罗斯作家共同的精神品质：使命感、人道主义精神、对民族和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宗教情怀等；他又是独特的“这一个”：他对痛苦病态般的敏感，对人性挖掘的深度，对读者的残酷，都使人不忍面对又不得不面对。从阅读兴趣说，我并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凭一个研究者的直觉，我又感到，读懂了陀氏，才能真正读懂俄罗斯文学。对陀氏的文化考察，也就成了我研究苏联文学的起点。

在苏联作家中，艾特玛托夫、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正好代表三种不同的类型。艾特玛托夫，大致属于主流意识形态作家，他作品中强烈的道德感、救世主意识，在苏联作家中颇具代表性。而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塑造的英雄人格，为革命而殉道的热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战争与人性之间的选

择，典型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及其在总的框架下的种种探索。对代表主流话语的经典作家作品的重读，有助于我们更冷静地看待苏联文学的总体品格。

帕斯捷尔纳克可算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这种自由主义立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若即若离，决定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基本处在边缘。边缘，恰恰为他提供了透视现实的一个独特角度。《日瓦戈医生》，作者把它看做是表现自己对人生、历史、真理的看法的一本书，明知可能根本没有发表的机会，但他毅然写了出来。正是因为有像帕斯捷尔纳克这类始终坚持独立、自由地歌唱的作家，才使苏联文学在单一中显出丰富，在一元中显出多元。相对于某些过于功利、聪明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不识时务，也就显得分外的可贵。

肖洛霍夫则介于中心与边缘之间。他同时获价值标准大相径庭的斯大林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为西方和苏联官方所接受，这在20世纪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意味着他作品本身就存在着多套话语，不同立场的人，怀着各自的阅读期待，都从肖洛霍夫作品中读出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那么，肖洛霍夫是怎样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取得平衡的，在作品中既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又让它能顺利地到达读者手中，这其中体现了作为一名苏联作家的怎样的“智慧”，他的小说的多重话语及其由此导致的不确定性、可阐释性，便成了我们感兴趣的话题。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一个人有时可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对一个人的阐释，也就成了对一个时代的解读。我就是这样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我后来应吴元迈先生之约，为《20世纪文学泰斗丛书》写的《肖洛霍夫》，带有作家传记性质，同样试图深入到肖洛霍夫内心深处，去体味其中的隐微曲折，通过解读肖洛霍夫，去解读那个时代。肖洛霍夫曾说过，他的传记就在他的小说中，那么，阅读他的作品，也就成了与作家心灵的对话。

我另外非常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写一本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书。读懂了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如果再加一个高尔基，我想，也就大致读懂了苏联文学。

通过一个人去解读一个时代，同时，在社会文化的大语境中，去考察一个人的心路历程、文化选择，这决定了我的研究主要走的是文化批评的路子。回头一看，从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意识》开始，十几年来，涉猎过俄苏文学的不少作品，但视角却是惊人的相似，即都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化考察。也许是研究生求学期间，正好处在“文化热”之时，读了一些哲学、宗教学、心理学、文化学方面的书，培养了对人文文化的浓厚兴趣，以至面对文学作品，我也更愿意把它当作文化的载体，把文学现象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把文学史同时看做是社会、文化变迁史，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史（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往往是考察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命运与选择的绝好话题）。这样做的弊病就是往往忽视了对文学的审美价值的判断。文学毕竟首先是一种情感的艺术、审美的艺术，其次才是文化的载体。长期的“偏食”，导致我在审美直觉力方面越来越嗅觉不灵。

不过，文化批评也为我提供了透视苏联文学的另一种眼光。俄罗斯地跨欧亚，文化亦兼具西方与东方的色彩，这决定了俄罗斯苏联文学的独特品格。如何把俄罗斯苏联文学放在俄罗斯文化乃至东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中，发掘文学的文化意蕴，便成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不只是就俄罗斯谈俄罗斯，而是在东西方的不同文化体系中，寻求俄罗斯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的互证、互动与互识。我在陀氏研究中曾做过一些尝试，试图把陀氏放在俄罗斯与东、西方文化冲突、融合中来看待作家的选择。而就苏联文学来说，苏联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探索、实验，本身就极为复杂，不同作家对待这一探索的不同态度，也就决定了各自

的价值评判立场及其艺术分野。传统的俄罗斯文化、西方文化、社会主义新文化，怎样在不同的作家身上打下不同的烙印，也就成了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文化阐释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社会风俗、地理、政治、宗教、道德、哲学、民族心理、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无不在文学中打下烙印，使我们得以多方面地去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文学。

鉴于自己在研究兴趣上容易偏于一端，忽视美学阐释，我也曾尝试，是否能把文化阐释和美学阐释结合起来。文学批评无非两大类型：文化批评与形式批评，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但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不能对文学的外部研究只局限于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而对文学的内部研究中，则只作孤立的艺术分析。巴赫金则在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研究的融合中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他的研究从形式主义起步，但他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引入文化研究的视角，突破了单纯的形式主义。复调、对话、狂欢化，皆是从文化的角度，对文学所作的美学阐释。这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任何“形式”的批评，都离不开文化的探源；反过来，任何文化的阐释，都须以文学性为旨归，不然，文学就真的变成文化学的材料了。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在探讨陀氏作为“都市主义小说家”与城市的关系时，曾努力揭示城市在陀氏人生与心理发展中打下的烙印，他在小说中所描绘的城市景观，他透视城市的视角，城市对他的小说艺术形式的影响等等，从文化的角度去探索陀氏小说的情节结构、风格、文体特征。而我对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艾特玛托夫小说的解读，也是希望在文化阐释中，使读者对他们的小説艺术有一些新的领悟。

三

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我的科研基本集中在俄罗斯苏联文

学，而在课堂上，却很难得有机会讲讲俄罗斯文化与文学。在大学讲台十余年，摇唇鼓舌，先后讲授过大学语文、汉语写作、中外文学名著、中西文化、比较文学等，因为面对的多是英语、文秘、工科的本、专科学生及研究生，加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风劲吹，满街争说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曾影响几代中国人的苏联文学，在课堂上越来越难找到知音。而曾经显赫一时的苏联文学研究，也日趋退居“边缘”。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让人生出几许惆怅。

于是，对我来说，苏联文学研究，几乎全凭的是一种兴趣。在课堂上，两片嘴皮论上下古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神采飞扬；课下，回到书斋，静悄悄地面对苏联文学，那情景，颇似老友重逢，寒宵对坐，回首前尘往事，令人感慨。从小对苏联文学的喜爱，化作了一种割舍不了的情结，尽管作为研究者，可以大谈苏联文学的危机、困境，但作为爱好者，却始终无法摆脱那份本能的亲切感。也曾经想告别苏联文学，但往往绕了一圈之后，鬼使神差地，又回到了那片最熟悉的土地，因为毕竟在那块土地上，有过我少年时代的梦想，青春的欢笑与眼泪。特别是在这个过于功利主义的社会里，苏联文学所弘扬的理想主义精神，对我们这些处在夹缝中的人来说，始终有一分动人的魅力。

感谢我的导师张铁夫先生，文集集中的部分文章，就是在他的指导乃至直接参与下写出来的。张先生是普希金研究专家，高鼻、宽额、秃顶，似乎命定就是为研究俄罗斯文学而生，弟子们背后都亲切地叫他“铁夫斯基”。不敢说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了多少现成知识，他在把我们领进俄罗斯那块广袤的土地之后，任由我们疯跑，只是不时指点一下，但从不强求：只能走这边，不能往那里走。正是这份宽容，使我们得以体验学术的自由与创造的乐趣。同时，张先生更吸引我们的恐怕还在于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宽厚、无私、与人为善、处事的周全。他从没有给我们高谈过

为人处世之道，但其行为本身，就时时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们，这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感谢吴元迈先生对我学术研究的支持与鼓励。感谢与我同龄或年岁稍长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界的同好们，虽然天各一方，但共同的志趣，又使我们有了一份心息的相通。这里特别要提到四川大学的刘亚丁先生，那篇关于肖洛霍夫的对话，就是我们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聊天的产物。对肖洛霍夫的共同兴趣，使我们互相觉得从对方那里获益良多。对于我们这批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我们似乎都是在做从功利的角度说虽然无益但今生今世不能不做的一件事。中国与俄罗斯，有太多的相似的东西，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虽然已成往事，但无论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都使这两个有着太多的苦难的民族，早已血肉相连。对苏联及苏联文学的思考，事实上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反思。曾在《读书》（1993年第3期）上读到一篇文章《为什么我们会同受煎熬》，读到那带有悲怆意味的追问：

我的罗斯^①，我的生命，为什么我们会同受煎熬？

我一下子就被深深地感动了。我知道，今生今世，与俄罗斯苏联文学的情缘，将注定是剪不断，理还乱，悲欢离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① 罗斯：俄罗斯古称罗斯。